

黄仁宇与宅男

■薛仁明

现代人强调自我，但渐渐地,却没有了自己。

上回，与高中老友吃饭，他带儿子一道前来。席间,除了用餐,他那初中刚毕业的孩子,没声没响,不插嘴,不议论,也未必必听着我们说话。唯一可见者,是始终专注玩着手机。老友感慨说,年轻一代,就是如此;除了手机、电脑,身旁世界,不闻不问,无感无趣;结果,电子用品伴随长大的这每个人，几乎都成了同一个样。发型、服装、语言,尤其是神情,都像极。有好几回,他远远望着一群年轻人身影,都以为儿子置身其中；真要近前一看,方知错认。

唉!怎么都那么像了呢?!是的,有史以来,从没一个时代,像现代这么爱标榜“个性”、“独特”与“自我”;但标榜了半天，也从没一个时代,如现代这般单一、同质而无趣。全世界各大城市,都市样貌,逐年一致;全球所居,大楼公寓,样式如出一辙;举世所穿衣物,日益相似;生活习惯,更都逐渐“美”化;吃麦当劳,喝可乐,听摇滚乐,看好莱坞电影,再一块儿用 iPhone。

他们似乎很有“想法”,却极易受欺被瞒。他们满嘴“个性”,实则乖顺非常;满口“叛逆”,却毫无反抗能量。他们勇于向父母顶嘴,怯于对流行质疑。资本主义通过种种的流行语汇,渗透他们生活每个角落,再挟其庞大的洗脑能量,将他们驯化成一个个的宅男宅女。从此,有手机有电脑,有影视歌手有运动明星,足矣;身旁周遭,不管人情物事,抑或天光云影,甚至一草一木,他们是既无兴味、亦无感觉,真让他们看了,也多半如动物呆视般的漠然。这漠然,让造物教的年轻信徒,变成了众口一声,千人一面;于是,不管他们如何表现“自我”,不管如何标新立异,终至面目模糊,最后,则是完全没有了自己。

年轻人失去自己,当然是成人造就出来的。成人世界,编造了一堆美丽说辞,不仅瞒却年轻一代,也欺骗了自己。你瞧!除了那些商业文案之外,有一帮知识分子,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

也不人人竞相标榜“独立思考”?但可怪的是,这些“独立思考”者,“独立”了半天,仔细一看,却好像也都是同一种“思考”。不仅“思考”雷同,他们竟连神情也极像,多是纠结甚深,多是忧郁难解。唉!怎么都那么像了呢?!

我想起了黄仁宇。二十几年前,我读台大历史系,当时黄仁宇风靡台湾知识界;我虽说读书不算太少,但其实也多半人云亦云;于是,因他叙述之“宏大”,观点之“新颖”,兼又人人喊好,自然,也轻易被慑服了。我虽隐隐觉得不对,但又哪有能力予以厘清?那得等到许久,待我离群索居十余载,而后,我做学问,终于有了自己的方式,不再受时潮摆布,也不再受学院左右。同时,我看人观世,甚至读书,也开始有种朝阳初起般的明亮感。从此,我才总算过了被骗之年纪;于是,我再看年轻人的高喊“自我”,再看知识分子的标榜“独立思考”,乃至于黄仁宇“新颖”的“宏大”叙述,都不免感慨!

黄仁宇的史学,是将庞大的中国历史材料纳入资本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其高明的叙事手法,恰好迎合了两岸力求经济发展,亟盼追上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之急躁心情。因此,他反复强调的“数目字管理”,便人人奉为主臬。但是,当资本主义真正深化之后,大家也才会逐渐明白: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其实,就意味着标准化,就等同于规格化。“数目字管理”,固可造就物量之勃发,但也扼杀了生命之自由。两岸相较,眼下台湾的“数目字管理”,确实略胜一筹;但也因此,台湾标准化更彻底,规格化也更甚;亦因如此,台湾宅男宅女比例更高,年轻人生命风姿萎失于电子产品中,于是更虚无,更面目模糊,更千人一面。

台湾年轻一辈,其实不乏聪明才智,更多良善温厚之人,但是,在这 20 年标准化、规格化过程中,在物化社会浸润下,逐渐失去了自己,也丧失了有感有兴的生命力。反观海峡对岸之大陆,近些年来,奉全球化之名,也迅速踏上标准化规格化之途,黄仁宇著作更在神州大地大红乍紫,“数目字管理”的“理想”,殷殷然翘首可盼。在一片发展的“硬道理”下,在大陆知识分子热切期盼中,我竟想起了台湾一个宅男干枯漠然的身影。此时此刻,这般联想,虽说有些煞风景,但有识之士,当不以我为河汉!

(节选自《人间随喜》,薛仁明著,同心出版社)

悼念恩师霍布斯邦

■陈文茜

10 月 1 日,95 岁的艾瑞克·霍布斯邦去世。他死后,英国卫报撰写其生平,定位他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纽约时报称,如果他愿意对 1917 年大革命所发生的一切作出深刻的批判,他的史学地位将更为举世推崇。

霍布斯邦可能是影响我一生思想最深的人。他自 1984 年至 1997 年每年秋季至 New School 授课。每当秋叶降落,寂寥的白雪来临前,他会待在纽约;把他一生最好的思想留给我们。

我待在纽约那几年,年年听他的课。或许是机缘吧,那正是世界剧烈变化的年代。1989 年柏林围墙倒塌,接着德国统一,然后苏联解体。当西方快乐地迎接这些剧变时,他在课堂上对后苏联国家的民族主义崛起,给予极为负面的评价。

我很难忘记他在课堂上的表情,1992 年他已预言如果波罗的海三小国可以公投独立,那俄国要如何解决车臣?美国能以相同人权立场支持车臣独立,让黑海舰队,核武器落入一个不可能亲美的伊斯兰国家手里吗?早于车臣悲剧发生前,他已预言未来车臣将内战不断。

霍布斯邦出生于 1917 年,那一年发生俄国大革命,这个年代决定了他的一生,直到 1994 年,他仍对那场大革命抱有乌托邦般的见解。1917 年之后,全球众多知识分子成为了人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信徒,他不只是其中之一,人生一路为此奋斗,但也心灵挫败至老。他的一生正如张爱玲所言,那个年代出身的人,身上好似都长错了一根骨头。所谓人生,就注定得历经主义的残酷;所谓成长,就是目睹大革命——背叛他的信仰。他的血液里,早蕴藏了必须比旁人看透民族主义的因子。他的父亲是波兰犹太人,母亲为奥地利犹太人。他出生于埃及,因为户政事务所之类的拼字错误,使他全家的原名 Hobsbaum 变成 Hobsbawm。从此不止名字,人生命定将错就错。

阅读霍布斯邦的回忆录,可以理解为何他

一路拥有那么多学术界的政治敌人,却无人能阻挡他成为史学巨擘。

回忆录从一张维也纳黑白照片写起,那是霍布斯邦最快乐的童年岁月;照片有他们全家和邻居,其中有犹太人、奥地利人、德国人。然后时代的色彩变了,先是他 12 岁,父亲猝死自家门口,接着两年后母亲因肺病死亡。14 岁,他投靠叔父成为孤儿移居柏林;接着 16 岁时希特勒取得政权,收养他的叔父带着他们逃至伦敦。而那张满载维也纳快乐童年的黑白照里,曾经一起烤肉、玩乐的邻居同伴,有的成了纳粹,有的进集中营,有的逃难,有的自杀身亡。

不需要太多历史书籍,他已从犹太血液中认清种族主义的疯狂。

留在伦敦,由于共产主义者身份,冷战麦卡锡主义高峰阶段,他曾长达十年以上被冷冻,一个不被牛津等“优秀大学”承认的学者。霍布斯邦如此形容自己:与宇宙错开一个小角度。

晚年,他仍想抓住主义中某些真诚,但他所钟爱的历史无情地向他摊牌。他已病重许久,根据女儿叙述,死前他的床头摊着许多报纸。在那些字里行间里,已经 95 岁高龄的他,再次目睹自己年少岁月大萧条历史重演。

霍布斯邦走了,哀悼他的文字,仍然大篇幅缠绕他的“十月革命”梦想,以及一生不愿放弃的理念。不过上了他六年的课,“大革命”在他心中留下的狐疑与烙印,使他对 1968 年的美国欧洲学生运动颇不以为然。他的狂热血液,某个程度已冷掉一大半——只是某种坚持吧,他只是一名被压迫于曾经信仰的主义中,坚持徘徊孤单的灵魂。

1998 年他领取英国国家荣誉奖,来得太迟,满脸风霜。那不仅仅是岁月之痕,还是无情历史彻底的刻痕,像刀刮一般的刻痕。

他走了,地球上少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天上多了一颗星星。

(选自《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2012 年 10 月 25 日第 512 期)

马德里,一座为了失恋才存在的城市

■虹影

餐馆对面有一个广场。周围都是古老的旧建筑,夹有宫廷高大整齐的房子,灯光也打得尤其神秘。

那一次我吃到塞满虾和海鲜的西红柿,是头道菜。西红柿是冷的,没有皮,从外表看不到一个缝隙,不知那些海鲜是怎么塞进去的,神秘加上味道鲜美,令我以后念念不忘。我好奇地想解开谜,可是不能。中国大厨,也做一个装虾的西红柿,是用刀小心地揭开盖,放得好,让人完全看不出。可是西班牙的这道西红柿呢,怎么解剖也没发现秘密之途。

朱利安会来这个餐馆吗?我对出版家说。那是我第一次对外人说到朱利安的名字,虽然我读了好些关于他的书,但小说还未动笔。

出版家说,他来过。

路边艺人弗拉明戈舞的节奏,让我把脸转过来,不管你来过没有,不过我希望这一次你来,因为我在这儿。



图片来源:昵图网

好几年过去,我写了朱利安。跟着他的魂魄,我带着另一个英国诗人专门去了奇科特酒吧。在马德里繁华地段 GRAN VIA 大街上,当年一批艺术家曾经常去,有七八十年历史了。旋转门里,外厅较小,里厅大多了,墙上挂满海明威等名人的黑白照片,旧人新人挤满一堂。这里酒好,餐前点心烤蘑菇,来者必点。这儿常有演出,皆是西班牙最有名的乐队,要知道当年酒吧并没有时尚音乐助兴和走红的歌星。我和他挽手走进,点酒后,蘑菇就送上了来,盘子里还有小西红柿,烤得正香,放了大蒜。

他喝着酒,我拿着插着竹签的蘑菇,望着他。我从不佩服一个人,可我佩服他,心里有由衷的喜悦。我们说着海明威,说《太阳照常升起》,谈到他的爱情生活与写作生活。他对自己爱惜如命,正由此,他才结束自己的命。中间我去找乐队的吉他手要了一根香烟,他抽了起来,说这支烟与众不同。

我说朱利安抽过。

他笑了,说你比別人更懂我的心。

之后好几天他带着我驾着车,进入那些美不胜收的山丘、古老的教堂,马德里远了,远到天边。

等到我返回马德里,准备离开时,曾经空洞的身体被塞得满满的,有伤痛,也有值得一生去珍惜的东西。

海明威,他最后一次离开马德里,失恋了。朱利安·贝尔,他也失恋了。我也失恋了,我们必须离开马德里。马德里,一座为了失恋才存在的城市。

又过了好久,我写了一首诗,说到马德里,“生活的经验,全在水里。一个吊死鬼,被她叫作亲爱的”。那首诗说到爱情,忘了美食,也说到梦境,呵,故意忘了现实。

(节选自《当世界变成辣椒》,虹影著,中信出版社)

想起山西老家的父亲

■赵穹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是与做完农事之后的母亲
在他们一起孕育的三间农舍里
孕育了小村的葱茏
以及我的三个兄弟
最多的时候
父亲与风一起
蹂躏在垅沟分明的田地
与日月星辰
孕育
一年四季

父亲喜爱春天里冒着热气的黄土
父亲还喜爱春夏之交夜莺与布谷的合唱
父亲更爱在夕阳西下的黄昏
与他那只乌黑发亮的旱烟袋
将一地的庄稼
滕胧为一幅与生命有关的水墨
密布厚实的双手与日见沧桑的脸颊
与归鸟喃喃的踪影
在画外留白……

父亲在收割一地的庄稼后
我又将父亲和他收回的庄稼
一起收入
我的诗集……

大亨与大使

■洪晃

我参加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奢华而无聊的商业活动,到场以后和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行欧美式见面礼;美国人用右脸蛋互相贴一下,法国人先贴右后贴左,意大利人先贴左后贴右。然后就正式开始无半点营养和真诚的寒暄。

只是偶尔,你还能无意听到一些对话,其精辟是可以概括整个世界的。有一次,我就听到了这样一段绝版精辟的对话,让我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有了顿悟。

这是一顿饭,在西班牙大使馆官邸。西班牙大使宴请中国金融大亨。

我们早到了,官邸里的服务人员还是很靠谱的,立刻把西班牙各种小吃都端出来。之后使馆的官员、旅游参赞、商务参赞都纷纷赶到。

中国大亨很有素质地介绍了自己的金融业务,并非常清晰地表示有意愿让大使介绍一些可以合作的西班牙金融项目。同时,也非常婉转、一点不大使觉得难堪地点了一下西班牙现在面临的金融危机。

大使完全明戏,说这正是他请吃饭的原因,国内有各种经济危机,也许是投资的机会。

这时候已经一点半了,在座的中国人都饿得不行,终于上了第一道菜——西班牙蔬菜汤。大亨的随从马上举勺喝了一口,之后略有惊讶地小声说了一句:“哟,凉的。”我看大亨快要举到嘴边的勺子又放回了汤盘。旅游参赞介绍道:“这汤叫 Gazpacho,是把很多新鲜蔬菜搅拌均匀汁,夏天吃尤其凉爽。”我心说,怎么解释也没用,中国人不会喝凉汤的,就是夏天也最多喝点凉茶。

汤盘撤掉后,大亨接着询问西班牙的投资机会。大使说:“你知道西班牙的好东西太多了,是的,现在他们的价钱也特别好,值得投资。但是,你知道我们西班牙最最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吗?”大亨立刻全神贯注,洗耳恭听。“那就是我们西班牙的太阳!”大使说。

我看到大亨的失望和惊奇已经小有挂脸。可是大使毫无察觉,接着非常兴奋地推销西班牙的太阳:“你知道,欧洲北部的人都会到西班牙来享受我们的太阳。而我的一个西班牙同事,被派到布鲁塞尔的欧共体工作,那里总是阴雨连绵,不到两年我的同事就抑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缺乏西班牙的太阳。”

在大使推销太阳的时候,大亨勉强把自己面前的一盘凉的大虾沙拉吃了一半。其他官员这时候也都帮腔一起卖西班牙的太阳。有的在引用西班牙的诗歌,有的引用文学,当然还有很多因为没有西班牙太阳而郁闷的亲身经历。

就在一派西班牙太阳的赞扬声中,热菜终于来了,烤羊腿。在座的中国人喘口粗气,有口热饭吃了。大亨在几口热饭之后,还是很努力地跟大使沟通西班牙的投资机会。他非常专业地告诉大使,现在有很多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需要海外的注册地址以及一名有海外身份的股东,这叫 V。大亨说,有些国家已经为中国上市工作的需求划出一些区域,并提供一些便利条件。“你知道,如果中国公司的注册地点在你们国家,”大亨非常有劲地解释道,“那么这个公司的所有业务就是注册国的,是注册国的 GDP 了。”

听到 GDP,大使终于抬头了。“西班牙和中国很不同,我们官员的政绩和 GDP 不挂钩,都是选出来的。”大亨认真地说:“所以啊,你们太需要体制改革了。你们的福利太高,政府压力大,但是官员又不积极创造收入。需要改革。”大使的头又低下,微微点头。

这时候甜点上来了。已经下午三点半了。大亨非常有礼貌地告辞。虽然官员们说甜点是西班牙特有的,用蜂蜜做的蛋糕。大亨和随同还是回公司开会去了。

这段精辟的对话告诉我,中国和外国区别不是什么开放和封闭,什么人权和仁道,其实就是喝不喝凉汤,吃不吃甜点。

(选自《南都周刊》,2012 年度第 28 期)